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 十 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 十 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昆明市环城北路)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代售

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

云南省期刊登记证云出字第079号

定价：四角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辑目录

- 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我的革命活动
..... 吴少默 (1)
- 二、我参加云南省工委工作的回忆..... 刘 清 (7)
- 三、来云南搞电台工作的简要经过..... 杨 才 (30)
- 四、四十年代云南妇女运动片断
..... 梁薇娟 (35)
- 五、回忆联大文艺社..... 张潜 (48)
- 六、弥勒西山根据地的斗争
..... 杨 固 (69)
- 七、昆明空军起义的前前后后..... 郭佩珊 (85)
- 八、解放金平的战斗
..... 口述：黄顺福 熊志高等 (100)
..... 记录整理：黄锋 李学兴 (100)
- 九、记边纵八支队工作片断..... 普之玉 (109)
- 读者来函：我对《谷拉地区革命历史初步
调查》的几点意见..... 李 兴 (124)
- 本刊第六、七、八、九辑勘误表..... (126)
- 本刊预定通告..... (128)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我的革命活动

吴少默

〔编者按：此稿系吴傲同志提供的（无标题），写作日期亦不详。我们仅录其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一段，并代加此标题。〕

一九二五年五月，广州准备讨伐滇军军阀杨希闵、桂军军阀刘震寰，广州党组织向上海党组织要几个云南籍的青年去做滇军工作。当时我们正参加支援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活动，领导决定赵宗华、赵济、陶光潮（都是上海大学学生）和我去。具体组织我们去的是张伯简。路过香港时见报知道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离开上海前，组织决定向上海环龙路左派国民党党部领取了党员证书，这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公开活动的需要。

到广州后很快就见到南方局负责人谭平山，他告诉我们，讨伐杨、刘的战事即将开始，已决定不再在

杨希闵的滇军里进行工作，将派我们到住在韶关的另一部份滇军朱培德那里去。在我们准备离开旅馆去火车站，刚下旅馆楼梯时，珠江两岸的战斗开始了。由于旅馆在北岸长堤，属于滇桂军势力范围，就困住在旅馆里。杨、刘讨平后，朱培德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进驻广州。因为领导对派我们到朱那里的介绍方式没有解决，又等待了一小段时间。六月二十三日，正当我们在参加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进行前的群众大会时，得到通知到维新路机关，由张太雷见我们，说朱培德到广州后，曾经几次向苏联总顾问鲍罗庭要求介绍政治工作人员到他部队里去工作，现在决定即用鲍的名义介绍我们（即赵、赵、陶和我）去见朱，并交给我们介绍信。我们见到了朱后，就由旅馆移住大沙头朱的司令部。我们到广州时直到进入第三军，组织和我们的联络人，都是陈赓。

我们到第三军后，朱培德又自行约来了两个云南籍的右派黄埔学生，一个是腾冲人马西藩，一个是安宁人高煊。经过我们和他们斗争后，这两个人很快就离开了。这时各界都要筹组国民党军队党部，由我和陶光潮到第三军驻地江村、清远、英德、韶关、乐昌去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工农运动三大政策。并收集了他们的全部官兵名册，了解了他们的部队情况。这个时期的党的领导关系，都是通过赵宗华联系。

回到广州后，正在组织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是党员朱克靖，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我任宣传科长，后又兼过组织科长，因为政治部与第三军军官学校同设在一处，也在学校里讲过政治课。

在军政治部时期，由上级党组织决定转入党，是朱克靖通知的。支部的小组负责人是李×洋，广西人，初是军政治部科员，后是七师政治部科员。但一切重要的政治活动以及在各团工作（没有其他党、团员），在行军和作战时，都是由朱克靖（后来由朱克靖和傅烈）领导。

第三军参加讨伐邓本殷时，调我担任十九团的政治指导员。平邓后由高州转回广州，调我担任二十三团的党代表（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驻某某军、师、团代表，实际上就是政治工作人员，由上级政治部任免，不同于政治指导员的是同级军官发布命令要由他副署）。这个团住在江村，没有参加北伐。北伐前调我担任二十团的党代表。二六年秋季，由驻地三水县的西南（地名）出发，经过韶关、郴州、衡阳、株州到醴陵暂住。我们的左翼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第三军才向江西攻击前进，经过新喻，万寿宫牛行战役，我都在前线。

牛行战事失利后撤，第三军因伤亡甚重，决定到萍乡招募新兵补充兵员，并把战后无兵使用的几千枝俄造枪带到萍乡保存，朱克靖派我和朱培德所派的团

长彭武扬同去，并给我内部介绍信到长沙请湖南省委在安源工人和萍乡附近的农民中协助动员，因此招募工作较为顺利。前线占领南昌后，来电要我们把招募得的新兵立即带回南昌，我们到南昌已是一九二七年元旦前后。

到南昌后，军政治部正在筹组第七师政治部，调我担任主任。

当时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已经在南昌，他和武汉政府之间的斗争正在发展。朱培德又由武汉政府任命接替李烈钧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王均（原第七师长）为第三军军长任南昌卫戍司令。朱、王因利害关系，初期还靠拢武汉。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很猖獗，总工会曾逮捕了国民党A B团首要分子程天放、罗时实等多人。为了配合情况的需要，通过朱克靖的推荐，我担任了卫戍部的军法处长。总工会把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寄关在卫戍部。我并参加了肃反委员会。

蒋介石占据南京后，他和武汉的对立更加明显。朱培德也已移驻九江，蒋介石曾先后派李宗仁、陈铭枢乘军舰几次来九江秘密与朱培德会见，要他逮捕第三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四月中朱回南昌找我说，为什么他在九江的行动政治部会知道，他在九江开了个军官会议，大家都不愿意朱克靖再当主任了，要我出来接任。我即严肃加以拒绝。自朱培德在九江的动摇日益显著后，江西省委即屡次打电派人向武汉党中央请示

如何应付，都无回答。朱培德因我拒绝后，他直接给武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电，邓即复电同意并正式发表任命我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江西省委因中央迄无指示，也无具体应付办法，只是决定让朱克靖暂避起来，由傅烈和我敷衍应付。朱培德催我举行就职仪式，经我拒绝后，又于五一前两日回到南昌，由王均通知我，定于五一前一日召集全军军官会议，五一上午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军官会议前他们利用轮流宴请金汉鼎邀我作陪的办法想绊住我，开会这天王均把私章交给我，要我替他处理公文，想使我不和外面接触，并且不时还打电话回来假意问：“有没有事？”但我还是和外面有联系的。当晚王还派了他的参谋用拜候为名到我住处暗中监视，可是他们在军官会上宣布要驱逐我们的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傅烈和少数几个重要党员已回避，党团员中存有内部文件的都已销毁。当晚他们在全城进行戒严，五一上午我和住在南昌的政治工作人员进入总指挥部的会议室时，埋伏着的警卫团就全副武装把会场包围起来。王均派了他的参谋长冯鹤荪来主持开会，他先把我拉到旁边一间房间里拿出一千元钱说，是王均送我的，我严厉地加以斥责拒绝。之后回到会议室。冯宣布江西夹在宁汉中间处境困难，已预备车船请大家到武汉去，我也发言斥责他们违背孙中山的政策。然后他们用武装押送我们到火车站，再由九江用船送往武汉，由九江

起船时还用兵船押送了一段路才转回去。

到武汉后很快即与组织联系上，并见到了周总理。当时其他各地在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也不断被迫来到武汉，总政治部设了一个临时接待机构，派我负责了短时间，接着又派我到十一军政治部任秘书。在准备八一起义前，武汉政府宣布要派东征军去南京讨伐蒋介石，并与朱培德接洽过东征军要经过江西，十一军也在东征序列。朱培德派了他的参谋长黄实来武汉表示，东征军过境他们没有意见，只是吴少默不能随同前去，如果去了恐怕要发生误会（意思是说要发生冲突）。领导才通知我留下不去，周总理要离武昌去南昌的当天，找我谈话要我去广东负责省委军委的工作，我表示因为能力太差，参加工作是可以，负责是胜任不了。当时没有决定，交由总理的秘书王翼飞另和我研究。后来接触了几次才决定派我来云南参加工作，组织介绍信和路费都是王翼飞交给我的。

我参加云南省工委工作的回忆

刘 清

一、南方局调我参加云南省工委

抗日战争开始，我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白区工作，是按照十六字方针进行的。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党中央毛主席又再次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的斗争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

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见毛选《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第六节）。

一九四二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提出七项条件的要求（见《周恩来选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一九四二年初和五月份我两次到南方局，见到邓大姐、孔原、钱瑛、于江震、荣高棠、许涤新等同志，那时全国形势正是处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次、二次（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反共高潮的情况下，钱瑛等同志向我传达党的上述方针政策。总的是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又联合又斗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当时执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四川、云南等地，疏散荫蔽了一批比较暴露的干部，切断了一些横的关系，改变集体组织生活为单线联系；在群众工作

方面，采取个别分散交朋友的活动，代替原先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我经组织疏散调在川东工作，作为川东特委候备负责人，寒假开始，在大足县女中当教员。五月份南方局通知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大姐告诉我说，组织已决定调我到云南，参加新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委员有侯方岳和我，郑、侯二人已于一九四一年去云南。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到昆明，云南省工委的工作也是按照上述方针政策进行的，接着全国又出现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三月至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省工委的工作分工，郑伯克同志掌握全面情况，具体管理统一战线、昆明市及滇西工作；侯方岳主管沾益以上的滇东北及昆明部分党员；我主管滇东、滇南，也有昆明的部分党员。我们在一起讨论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总的工作布置。但具体的组织工作情况，郑伯克管的部分我们不知道，不过问，侯与我管的，也互不知道，不过问，我们分别向郑伯克报告研究。这是一种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

一九四二年后，省工委的工作，大体分为两段：一段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投降以前，执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段是日帝投降以后，执行的是反蒋统一战线。经过一九四五年“一二·一”运动，与一

九四六年七月的“李闻案件”，直到一九四八年初公开发动反蒋武装斗争。

二、坚持学校据点，继续发展进步势力

我到昆明后，郑伯克同志将滇东罗平、陆良、弥勒、泸西及滇南蒙自、建水的地下党组织交我管理。我是经过疏散在昆明的吴世霖（原罗平负责人）联系罗平地下党。罗平是当时云南地下党员最多的县，抗战初期建党后，党员发展到四十余人，并且在东路板桥镇、中山乡、金鸡乡及城区附近建立了若干农民小组。皖南事变后疏散了一部分，留在本地坚持工作的地下党员约有二十人。罗平县城区负责人为张惟清，板桥镇（包括中山乡）为张鸿逵。城区地下党员主要有张树岗、张蕴朴、纪翠碧（女）、徐学仁、雷敬天、雷文波、彭居桃等；板桥镇有盛其德，吴世渊、赵玉清、陈启仁等；中山乡有查士达、唐德琨、李家琳、陈忠弼等。

陆良县地下党留在本地坚持工作的有马街子小学校张为栋、朱杰及刘怀富等约七人。

弥勒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许南波、姜必德疏散。姜来昆明在云南大学当职员。留在虹溪工作的有哲学尹炳坤，虹溪师范教员孙光宝（孙琳）及彭荣昌等，县城有张法权等共约十一人。

泸西县有土地革命时代老党员赵国徽及张木天等

在泸西师范任教，连同小学教师，地下党员共约五人。赵不久也疏散离开。

建水县郑伯克同志交来一个建民中学教员地下党员孙仲宇由我联系。实际上建民中学还有其他地下党员。

蒙自草坝农场交来一个老地下党员西康人戴澄江由我联系。

据说抗战初期陆良、弥勒、泸西、建水、石屏、个旧一带地下党员也较多，抗日救亡运动也很活跃，弥勒虹溪与石屏师范都有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我地下党员的事发生。因此这些地方地下党员也疏散很多。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在蒋管区后方，我党的工作确受到影响。

云南省工委贯彻中央的十六字方针，采取了正确的措施，除了必要的疏散一些地下党员外，在许多地方都留下党员坚持斗争，主要是保留了一些学校教育阵地。例如罗平中学，抗战初期即为我地下党所掌握，地下党负责人吴宗遥、刘璧华，地下党员丁建华、赵祖武、陈鸿图、张蕴朴、张树岗等同志及进步人士尹兰冰等在学校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〇年六月发生“尹刘事件”，尹兰冰、刘璧华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逮捕，后未查出证据，经组织上营救，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狱。但罗平

中学一直为地下党和进步势力所控制。地下党员张蕴朴长期在伪教育系统任职为掩护，以后担任罗平县政府教育局长，控制了罗平县的文教工作。一九四四年起我党推荐进步群众王之达（曾因思想进步被捕，经营救出狱）为中学校长，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罗平公开发动反蒋武装斗争，学校师生也参加打游击，学校停课为止。罗平中学是云南省从抗战初期就为地下党所控制的几个学校（建水建民中学、沾益播乐中学等）之一。在发展进步势力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罗平地下党自“尹刘事件”后，停止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改为分散交朋友的方式，争取团结群众的工作。并利用合法形式组织“罗平中学校友会”，团结教育罗平青年。

罗平还有几个小学也是类似情况，从抗战初期到武装起义，一直是我党工作据点。如城区罗雄镇中心小学，校长较长时间是宋维业；中心分校校长张树岗；板桥镇中心小学校长张鸿逵；中山乡中心小学校长任学源等，都是地下党员。

在弥勒虹溪镇中心小学地下党员姜必德原在该校任校长，一九四三年地下党员姜必元回虹溪后，又接任该校校长。一九四五年姜必德和地下党员薛粹（子瑛）一起到弥勒县中任教，加强弥勒县城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初又调薛粹回家乡，在曲靖中学任教，开展曲靖地区工作。

陆良马街子萃山中学一直是我党工作据点，直到公开发动武装斗争时，学校大多数师生也都参加了游击队。

滇南建水建民中学号称云南的“陕北公学”，校长刘宝煊（抗日战争前曾在日本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教导主任方仲伯（地下党员，由延安派来云南工作，由南方局单线联系），学校教职员一直是地下党员、进步群众占绝对的优势。先后曾有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徐日暉、方文彬、岳世华、张连琛、郭用、周天行、杨纪庄、孙仲宇、舒守训、杨知勇、魏谅、卢华泽、廖必均、马识途、陈家震、何以中、廖新伦、罗广斌、徐守廉、田金铭等，共约六、七十人到一百人在该校工作和任教。从抗战初期到滇南发动反蒋武装起义，建民中学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组织上先后派到建民中学担任教师的多数是西南联大或云大的地下党员或民青盟员。一九四二年七月我接管后，经孙仲宇、吴玉夫同志（建水人，地下党员，由延安回云南，在昆明正义路开岫峰拍卖行，以后回建水、蒙自、个旧一带开展地下工作）等介绍该校学生入党的，先后有郭树勋、昌宝宏、白一平、刘宝云、黄源昌、谢家林、李灿、孔永清、刘朝义等。

石屏师范在抗战初期有一批地下党员在该校工作，李公朴等进步人士曾来石屏宣传抗日。以后，有

地下党员刘燮和、何宏年、华立英、陈国仪(女)、孙仲宇等在石屏师范任教，这些地下党员和进步老师以后又都疏散了。一九四三年郑伯克同志将该校教师、地下党员范嘉乐交我联系。范于一九四一年吸收石屏青年普恩永、许立纲入党。同时建水进步学生昌宝宏、刘宝云与石屏学生王知白、廖学民等曾经因找不到党的领导，就自发地组织了进步组织“建石总支”。昌宝宏入党后，接着介绍了王知白、龙石官(龙云翔)、钟风彩(钟君劭)等入党，以后又经范嘉乐、王知白、钟君劭等先后介绍石屏学生及当地青年李鸿顺(李铨)、李家旺、许国柱、方金城、廖学民等为党员。一九四四年又有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邓识生、胡宗礼等在石屏师范任教。

在滇南，我党以建水建民中学和石屏师范为主要据点，继续发展进步力量，并向元江、蒙自、个旧、元阳展开。

在普洱磨黑中学，先后有不少西南联大进步学生在该校任教。早在一九四二年，吴显铖(吴子良)、董易(董大成)同志就在那里工作，其中有黄平、陈盛年和卢华泽是从广西、广东疏散到云南的地下党员。经过黄、陈等我党又建立了陆良中学和磨黑中学两个据点。当时在陆良中学任教的进步教员刘国志(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党员，后调重庆，在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牺牲)、董易、李循棠、于立生、陈端芬(女)